

汪金友杂文选

赴忧集

文化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位卑未敢忘国忧（代序）	李庚辰（1）
追 求	
有感于“梨园三怪”	（5）
“第一”的困惑	（7）
“四十五”与“五十九”	（9）
把自己的“苹果”拿出来	（11）
秘书的“危机”	（13）
昨天·今天·明天	（15）
日历·学历·资历	（17）
从吃苦起步	（19）
一身备“三穷”	（21）
书中自有“黄金屋”	（23）
自用其才	（25）
耐得寂寞	（27）
革 故	
“聚官盆”	（29）
“大门口”之恋	（31）
“下情上达”与“上情下达”	（33）
割下的“瘤子”往哪儿搁	（35）
“优越性”一解	（37）
慎做“预言家”	（39）
“两千”大于“八千”	（41）

“否定”并不可怕	(43)
“毛驴精神”可取	(45)
麦哲伦万岁	(47)
唐僧的老婆	(49)
颂 德	
笔下无情	(51)
“窝”的考验	(53)
以普通战士自束	(55)
为自己错误立“传”	(57)
留下两行省略号	(59)
“忘记爸爸”	(61)
鲁迅的哀愁	(63)
一江春水不白流	(65)
“怎样进去，怎样出来”	(67)
人过留名	(69)
“我不要”精神赞	(71)
免得阇闾话短长	(73)
尊“指过”者为师	(75)
请到我们唐山来	(77)
修 身	
成也权力，败也权力	(79)
撕破“一团和气图”	(81)
“地上的碑”与“心中的碑”	(83)
“练嘴”与“练腿”	(85)
“二民主义”	(87)
见面问三条	(89)
“自我感觉良好”	(91)

何必“亲校簿书”？	(93)
“台上美”与“台下美”	(95)
“面子”的随想	(97)
我是一个官，来自老百姓	(99)
“隐形叶”靠不住	(101)
假如再一次投胎	(103)
用 才	
让孙悟空当第一把手如何？	(105)
话说“出难题”	(107)
人有七种颜色	(109)
在横竿面前人人平等	(111)
人才霸	(113)
“强龙”相伴育雄兵	(115)
“压主”之忧	(117)
找马与驯马	(119)
就地取“才”	(121)
就怕糊涂官	(123)
也说“地球照样转”	(125)
猫的诉说	(127)
农民的远见	(129)
给猪八戒戴个“紧箍咒”	(131)
讽 俗	
变脸儿	(133)
阿Q致鲁迅的信	(135)
阿Q定律	(137)
阿Q的“委屈”	(139)
恐龙的悲哀	(141)

“占山头”与“包山头”	(143)
请唐僧念念紧箍咒	(145)
真假“鲁迅”	(147)
“厂长不是人干的”？	(149)
派来的·要来的·选来的	(151)
板子找不到屁股	(153)
照顾个黄牌	(155)
杞人忧“球”	(157)
“表叔”不可畏	(159)
“埋苍蝇”的研究	(161)
“适应”与“征服”	(163)
愿讨债公司早日关门	(165)
“愿相公无权”	(167)
八十年代的“拍马术”	(169)
“耍蛇”与“耍人”	(171)
戒 奢	
陋衙铭	(173)
涨价与起哄	(175)
李白的遗憾	(177)
“希望”的困惑	(179)
假如十年不盖房	(181)
“盖房猛于虎”	(183)
从筷子说到消费	(185)
“白菜汤”与“储粮缸”	(187)
我——比你阔多啦	(189)
为“企”也要清廉	(191)
党风与家风	(193)

“快活林”里缺“武松”	(195)
乡 情	
塔之功罪说	(197)
假如烈士复活	(199)
龙生九子个个疼	(201)
家乡的歌谣	(203)
家书抵万金	(205)
独占春风第一天	(207)
但悲不见九州同	(209)
“中国人鲁迅”	(211)
众手筑起的丰碑	(213)
东方人与“东方式”	(215)
拜年有术	(217)
大熊猫自传	(219)
后记	(221)

位卑未敢忘国忧

(代序)

李庆辰

这几年，在不少报刊上都读到过汪金友同志写的杂文，后来听说，他是冀东滦南县的一位年轻作者，写作勤奋而刻苦，为人也十分忠厚，于是引起我进一步的关注。去年，在《杂文报》于北京举行的“鲁迅风”杂文征文授奖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汪金友同志，虽未及多谈，却给我留下了朴实谦和的印象。近来他要出版他的第一本杂文集，要我写篇序言，我虽然知道作序之苦，更自知不堪此任，但对金友的诚挚相邀，却甚觉不便推辞，只好鼓起勇气恭敬从命了。

杂文这种文体，在我国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时下差不多所有的报刊上都不约而同的辟有名目不同的杂文专栏，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写杂文却不易，看轻而实重，它要有点知识，有点文采，又要讲道理，篇幅又不能太长，这就要有精辟的思想、广博的学养、凝炼的功夫，尤其是，杂文是批评的、战斗的，对人民的事业，对革命的、新生的事物，对益国益民的好人好事，它固然可以热情讴歌；但其更主要的职能，则是对腐朽的，反动的东西、

对害国害民的坏人坏事戟刺鞭挞，对错误的、落后的东西痛下针砭。在揭微显隐、条分缕析中指出痼疾所在，以达疗救的目的。这就免不了得罪人，招人怨，讨人嫌，甚至遭到“对号入座”者的打击报复。因此，写杂文的人得要准备吃苦，得要准备有人骂，得有升不了官、发不了财的思想准备。换句话说，得多一点公心，少一点私念，要有胆有识、有智有谋、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有一点普罗米修斯的牺牲献身精神。我想，有了这些，才算具备了写杂文的前提条件。否则，那就最好不要写杂文。如果硬要写来，恐怕也是很难写出振聋发聩、有益世道人心的好杂文的。

读了汪金友同志的《赴忧集》，觉得他颇具一个杂文作者应有的胆识和才情。他以年轻人特有的锋芒锐气，将爱国爱民的忧患意识溶铸笔端，向各种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错误言行奋力冲击，每每直刺时弊之要害，表现出了相当的战斗力的。象《聚官盆》、《派来的·要来的·选来的》等篇什，均是嫉恶如仇，正义凛然，很有些鲁迅杂文的风味。金友此集以“赴忧”为名，就表现了他“位卑未敢忘国忧”的情怀，他的文、题、言、行是相符的。除了批评针砭，金友的杂文中也不乏所谓“歌颂性”杂文，象《“窝”的考验》、《塔之功罪说》等，他这类杂文与假大空的高调有所不同，它是在热烈地歌颂着所是中无情地鞭挞着所非，在褒扬真善美的同时批判着假恶丑，与批评性杂文同样显现出刺世疾邪、抑恶扬善的战斗功能。这可以说是金友杂文的一个特点。没有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真情，没有大公无私、牺牲奉献的热忱，就很难写出敢爱敢恨的杂文来。

除了上述，我认为，金友的杂文还有以下一些特点或优点：

一、时代感强。紧紧围绕时事，讴歌先进，抨击腐朽，激浊扬清，扶正祛邪。纵观其作品，就如历史留下的一串脚印。如《厂长不是人干的》，就厂长在工作中遇到的烦恼，揭示了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和斗争，小中见大，短中见长，颇能给人以启示；《“第一”的困惑》则从体育比赛中我们得了第一后国人的狂热，说到我们按人口平均的许多倒数第一，泼下一瓢冷水，使国人清醒起来，从而激起国人新的奋起，以在更大范围的“国际比赛”中夺取更多的“第一”。这类文章，不仅令人自新，催人奋进，也有着时代的信息，可以从中看出时代的眉目。

二、渗透着强烈的青春活力。金友虽已过了“而立之年”，但就杂文作者队伍来说尚属“小字辈”，他似也喜欢用青年人的眼光观察世情，议论是非，写出的不少作品洋溢着青年人特有的激情，闪耀着青春的火花，和青年人声气相应，灵犀相通。如《让孙悟空当第一把手如何》、《在横杆面前人人平等》、《昨天·今天·明天》等都很能拨动青年人的心弦。这样，他的杂文赢得不少青年读者的喜爱就不足为怪了。

三、忧患中充满着信心。金友的杂文虽不时指出社会痼疾，却从不悲观失望，而是以冷静的分析指出症结所在，以负责的态度寻到救治办法，以革命人的乐观精神指出光明的出路。他从不做简单的否定，而往往是通过具体的分析，批评该批评的，扬弃该扬弃的。对于批评的人和事，也从不一棍子打死，而是象亲人谈心，诤友规劝，力求让人在“恍然大悟”中自我反思。如《板子找不到屁股》、《杞人忧“球”》都有这样的效应。

四、推理论证比较严密。注意从多方位、多角度看问

题，力求全面性，力避片面性。据说，为此，他除了积累大量资料外，还常常请教有关的同志，有时为写一篇小杂文，竟奔波走访十数人，其写作的严肃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五、金友的杂文也不乏知识性和幽默情趣。其中《给猪八戒戴个“紧箍咒”》、《阿Q致鲁迅的信》等读来简直使人忍俊不禁。

自然，金无足赤，金友的杂文也有略感不足之处。在我看来，一是文学色彩尚可进一步加强。当然这并非易事，对我们每个杂文作者来说，提高杂文的文学色彩，加强杂文味，都是一个重要课题，且心有余而力不足者所在多有。但作为一个要求，一个标准，我们人人都需于此努力，金友自然亦然。再者，析事论理，似宜尽力往深处挖掘，力触事物的底蕴。思想的深度，往往就是杂文的深度。想得深，写得透，角度新，言人人所想而人人不能言，又言之成理者，才是言论的妙处。陈言务去，独辟蹊径，方可望进入杂文的佳境。在这方面，金友已有一定建树。我相信，只要他百尺竿头，不辍登攀，必有更多佳作问世。以金友的刻苦勤奋和聪敏不懈，其杂文完全可能成长为我国杂文百花园中一朵娇艳雄峻的奇葩，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1989年6月25日于北京

有感于“梨园三怪”

清末民初，我国京剧界曾有一位誉满南北的名伶，被时人称为“梨园三怪”，至今仍传为佳话。

一怪是跛子孟鸿寿。他自幼患了软骨病，身长腿短，头特别大，脚小而纤弱，行走不便。但他暗下决心，苦学二年，扬长避短，成为独树一帜的名丑，被戏班、戏园争相邀请。

二怪是瞎子双阔亭。他自幼学戏，后来因病双目失明。但他并未灰心丧气，反而更加勤奋苦练，在台下行走要人搀扶，但上了台却泰然自若，寸步不乱，成为功深艺湛的名须生。

三怪是哑巴王益芳。他先天性不会说话，平日看父亲演戏，一一默记于心，虽无人教授，但每天起早贪黑依样照瓢练功。艺成后一鸣惊人，成为有名的武花脸，后被戏班奉为导师。

他们是身体的不幸者，但又是事业的胜利者。他们的成功，没有天资，没有神助，说他们“怪”，只不过是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创造了非凡的成就。因此，人们在惊叹、仰慕他们成就的同时，就不能不看一看这跛子、瞎子和哑巴身后的成才成名之路。

世界上许多珍贵的东西，往往要等失却了它，或渴求而终

不可得时，才会越发体会其珍贵。而拥有珍宝者，却常常容易忽视他的存在。“三怪”孜孜以求和最后得到的东西，不正是一些人在庸庸碌碌的生活中所失掉的吗？他们讳于短，失于志，惰于身，欲进而畏难，爱誉而怕苦，总希望有一天天上掉下成功的秘诀、胜利的桂冠。做为这样一个肢体健全者，难道在“三怪”面前能不自愧么？

贝多芬说过，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在前进的征途中，谁都有短，有失，有可能遭受不幸。但这种“不利与艰难”，却又可以激人励志，催人奋发。“三怪”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在不幸面前，处逆境而不馁，痛己短但不甘于短。为了补短避短，而更加贵己长，苦己身，在心血和汗水的考验中，坚韧不拔，矢志不渝。“顽强是个妙不可言的东西：它可以把山移动，使你不敢相信和想象。”这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经验之谈，也就是“三怪”成功的“秘诀”。

我们要实现四化大业，需要十亿人的共同努力，其中有艰难，有曲折，也有天赋条件的“不幸”者。但比起“三怪”来，我们又都是“有幸”者，因为我们生的是社会主义时代，干的是人民的事业。所以，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坚韧不拔的毅力，过去的“怪事”就会变成今天的“常事”，四化的宏图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1982年1月25日

“第一”的困惑

第十届亚运会的“金牌总数第一”着实使国人激动了一阵。但乐后思乐，发现还该有另外一种算法。即把这次得的94块金牌，按10亿人口平均，那么就是1060多万人1块。而南朝鲜不足4000万人，却得了93块金牌，平均43万人就有1块；日本1亿2千多万人，得了58块，平均219万人1块。这样一算，连得了1块金牌的卡塔尔和黎巴嫩，名次也都应排在我们之前。

如果当时这样算账，肯定有人接受不了。从来体育比赛就是以国家和地区论名次，你这样讲，岂不是“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志气”？但这毕竟也是客观的事实，而且这种算法也不无道理。

体育如此。倘若把这种“名次排列法”引入到经济生活中，比如钢铁产量、煤炭产量、国民生产总值之类，那么我们也会“扫兴”地发现，中国的名次还要往后排。看总数，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排世界第八位，但按人口平均呢？就惭愧了，靠后到一百多位去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发达国家现在一个人拥有的东西，中国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才拥有。所以，我们大可不必看着人家一户一辆小汽车，一家一部电话机而眼红，而急于即刻也有，更不必为一时买不到彩电、冰箱而发牢骚、冒怨气。每逢脑袋转不开的时候，就多想想“我们还不是第一”，还得过清苦的日子。

的确，我们有过许多“第一”。最近看到一本书中，就列举了184项“中国的世界之最”。没事儿的时候翻一翻，确实可以使人振奋，产生一种荣誉感。但只要头脑冷静下来，就会发现，那大都是“老天爷”和“老祖宗”赐予的。我们应该感谢恐龙，是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蛋，使我们多了一项“世界第一”；我们也应该感谢大熊猫和金丝猴，是它们坚定不移地在我们这儿定居，使我们的动物园稀罕无比；我们还应该感谢太空把世界上最大的陨石扔到了我们这块土地上……。

可惜，这些东西变不来电冰箱和电视机。相反，“第一”心理的强化，反而容易滋生出盲目的保守性和排它性，使人不注重和不善于吸收外来先进的东西，甚至忘了穷困的家底，得意忘形地摆起阔来。

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几乎都能讲出一大堆自己的“世界第一”。而对于“第一”的态度，却各不相同。1979年，美国学者傅高义写了一本书，名为《日本名列第一》。按说，日本人该高兴吧，然而，他们却老大不满意，说：“傅高义为什么不直言我们弊病？”有的甚至认为：“这是美国人想麻痹我们的斗志，是阴谋！”

他们可能害怕，讲“第一”讲的太多了，会使人只陶醉于过去的成绩。而在今天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只有保持“忧患意识”和“民族反省意识”，才能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一”，我盼望你的到来，也盼望把到来的忘记！更重要的是创造今后的“第一”！

1988年9月28日

“四十五”与“五十九”

有这样的人吗？明明自己是四十五岁，却对别人说是五十九？有，这个人就是鲁迅。

一九二六年秋，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有一次，一个叫陈梦韶的青年，问起鲁迅的年龄，鲁迅郑重其事地回答：

“五十九”。可是到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陈梦韶看了讣告之后，才吃惊地得知，鲁迅在厦门那年只有“四十五”。

许多人都在“高堂明镜悲白发”，而鲁迅为什么偏偏给自己加上十四个年头？有人说，当时鲁迅胡子长，头发乱，面容枯瘦，即便他告诉人们是四十五岁，也会有人不信。因此，为了减少误解，鲁迅才不得不“谎报”。

也许，这种推测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鲁迅的用意大概还不止于此。试想，假如一个人想到自己已经到了“五十九”，明年就是“花甲”、就要“退休”的时候，该是怎样一种心情？恐怕第一个感觉，就是“时间不多了”，该写的东西要“赶快写”，该做的事情要“赶快做”。鲁迅就正是这样想的，他曾说过：“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要赶快做”，这才是“四十五”变“五十九”的奥秘。

把“四十五”当成“五十九”，就会给自己造成一种紧

迫感，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更大的价值。这就象竞赛场上的老运动员，越是想到自己即将离队，就越珍惜眼前每一场比赛的宝贵机会，从而使自己保持一种紧张的竞技状态，力争创造更为优异的成绩。

古今中外，很多有所成就的人，也都是经常用“五十九”来鞭策自己、督促朋友。一次，列宁在批准了一位同志的计划后，听这位同志打算在第二天开始执行，便说：“为什么不今天开始呢？就是现在！”大画家柯罗给一位向他请教的青年画家指出了几处不足地方，青年画家说：“明天，我全部修改。”而柯罗却激动地问：“为什么要明天？你想明天才改吗？要是你今晚就死了呢？”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够工作的时间更为短暂。有些人害怕老，甚至不敢承认老，想方设法把“五十九”说成“四十五”，但他们却不知道怎样对付老，战胜老。据传，苏东坡很喜欢夜间静坐读书，并为此写了一首小诗：“无事此静坐，一日为二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白天工作，夜间读书，不是一日变成两日了吗？他说的很有道理，要想延长自己的生命，唯一的“诀窍”就是多学、快做。否则，只靠向别人少报几岁，或者把身子打扮得再“年轻”，都丝毫减缓不了衰老的速度。

黄兴有言：“墨磨日短，人磨日老；寸阴是竞，尺璧勿宝。”还是让我们怀着“五十九”的心情，施展“四十五”的精力，采用“二十岁”的速度，赶快做吧！

1987年7月14日

把自己的“苹果”拿出来

英国大文豪肖伯纳有一段名言：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流这些思想，那么，我们每个人将有两种思想。”肖伯纳形象地说明了思想交流的作用。按决策学的观点，这叫善于利用“外脑”的艺术；用控制论的话说，这又叫“智力放大”的本领。

人的思想是丰富的，每个人的头脑，对他人来说，都是一个思想的宝藏。而生活的任务，就是开发、交流和利用这些宝藏。

在人类发展的文明史上，有过一次飞跃性的进步，那就是学会了交换。你牵来一只羊，他拿来两把斧子，货换货，两家乐。自从人们发现了交换的价值后，商品市场便成了不可缺少的生活领域。然而，思想交换的“市场”却随着政治风云的变换，时明时暗，时有时无。留在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最深的，是那动乱的十年。有多少人，只因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日记而被关押定罪，祸及子孙。

于是，一些人接受了这个“血”的教训，关起门来论世，闭着嘴巴做人。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写了一篇题为《平庸等于慢性自杀》的文章，表示要不断充实自己，升华自己。